

了几种过渡过程的计算方法，并作出了相应的理论分析。当时论文要全文寄出，好像要一百份，都是寄给单位，不是个人，回复的审稿人必须有一半以上同意答辩，才能组织答辩。答辩是由国家考试委员会执行，黄皮书规定了如何组织国家考试委员会，我记得我的考试委员会主席是东北电管局的黄新民总工，他上世纪50年代曾在英国留学，在东北有很高的声望。我的

论文答辩是满分5分，后来的事实已证明该论文奠定了今天在中国广泛采用的自激励系统的基础。

研究生阶段受到的教育，改变了我一生的方向和追求，同时在做学问的态度、方法及基础技能上，也受到良好的熏陶。可以说，今天的我在学术上的成绩，大部分归功于大学及研究生阶段的培养。

六十年前听教授“洗澡”

○李景端（1951—1952经济）



李景端学长近照

杨绛先生写过一本书取名《洗澡》，其背景是1951年冬季某研究单位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我有幸也经历了那个年代的这个过程。恰逢今年是清华百年校庆，不禁想起了当年听教授“洗澡”的一些往事。

1951年秋我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因为新宿舍未建好，这一届新生推迟到10月

才报到。那时不设校长，只设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叶企孙，副主任委员周培源。才上课不久，就开始了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校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在动员报告中，要求教师勇于暴露思想，要像“洗澡”那样脱光衣服，彻底洗去旧思想污浊，还形象地鼓励说：“就当在澡堂里，彼此都脱光，也就没什么不好意思了。”

于是，教授们人人都要挖思想，做检讨，划清界限。多数人是在系或院的小会上做检讨，对于小会上“洗澡”没过关的重点人物，则要在全校大会上再做检讨。小会限教师范围，每班级只有一两名学生旁听；至于大会则全校师生任何人均可参加。我因为是当时经济系一年级的“总干事”（即后来的班长），因此有机会作为学生代表，旁听了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陈岱孙的检讨会。陈教授向来一副英国绅士派头，做起检讨也像平时上课一样，慢条斯里，文质彬彬。他在检讨中有很大

□ 母校纪事

篇幅批判自己以前“迷信”凯恩斯经济理论，中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他讲得详细，“批判”深刻，使我从中了解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前世今生，比枯燥的上课还更有收获。鉴于陈岱孙态度诚恳，重点突出，那天一次检讨就过关了。我也因尝到这次甜头，随后只要出海报说有教授检讨大会，我都一一去听。这并非我政治上多么积极，而是因为教授们的检讨，不论是学术上还是为人处世上，所讲的内容都是我从未听说过的新鲜事。好几位的检讨，观点新颖，逻辑严谨，文字优美，简直就是一篇好文章。连续几周，我把听教授“洗澡”当作去上课一样，又听又记，煞是认真。有趣的是，往往讲的人在台上检讨自己，痛骂过去，而我这个听的人，觉得那些真不简单，反而对他更佩服更仰慕了。

听了多次教授们的大会检讨，我不由得也萌发了一些感慨。一种是佩服，例如费孝通。他的口才极好，又善于煽情，在检讨中他逐条罗列自己“罪状”，主动上纲上线，把自己痛骂一顿，而且声泪俱下，得到广泛“同情”，很快就通过了。对这种有学问、能应变、会检讨的一些教授，我是由衷地佩服。还有一种是惋惜，例如潘光旦。那天他拄着拐杖，一条腿站立着做检讨，我真有点于心不忍，就写了一张小条传上去，建议主持会议的人让潘光旦坐下讲。但他谢绝了，仍然站了个把钟头坚持讲完。潘光旦好像不如费孝通会应变，他没有全盘否定自己，只检讨了他认识到的错误，比如承认有过唯心论和单纯教育救国思想，认为知识分子也爱国，自己是爱国的。在当时那种宁左勿右的氛

围下，你不痛骂自己，反而申辩，这怎能过关！于是发言的人，不是说他避重就轻，就是批他还怀念过去，不肯跟旧思想决裂。清华当年是以工会名义来组织这场思想改造运动，那天主持会议的正是当时清华工会主席陈岱孙。他根据众人发言的意见，宣布潘光旦这次检讨态度不够端正，检查不够深刻，要求继续深挖，下次再做检讨。

潘光旦检讨没通过，只算是“洗澡”中被泼了一点温水，而雷海宗教授的几次检讨都没通过，就无异“洗澡”中被泼了热水了。因为雷海宗参加过国民党，又在国民党政府中做过事，这就超出教书育人这个范围而涉及政治了。对他的检讨，好多人关注的重点不在学术和教育领域，而是追问他的政治背景和政治企图，而这些恰是许多旧知识分子很难或无从说清楚的。尽管雷海宗在大会上痛哭流涕，但还是没有通过。像这样在“洗澡”中受到不同程度伤害的，自然不止雷海宗一个人。身为当年“洗澡”运动的一名听众，我对当年潘光旦和雷海宗的处境，除了费解，就只有惋惜了。

紧接着教师思想改造，又在全校兴起了忠诚老实运动，要求全校师生员工人人交代历史和社会关系，向组织表示忠诚，实际上把“洗澡”这个运动从教师扩展到了学生，现在回想，这些自然都是当年极左思潮的产物。

清华大学的百年历程中，有过辉煌，也难免有曲折，六十年前的“洗澡”一举，也算是她前进步伐中留下的一个小足迹吧。

2011年6月